

書名：公民不冷血——新世紀台灣公民行動事件簿
作者：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主編：管中祥
出版：紅桌文化

當新社運遇到新媒體 文：何明修

二〇一一年，以臉書（facebook）為媒介，全世界推動起一股社運的風潮，從阿拉伯之春、西班牙的憤怒者抗爭、到源自於紐約後來擴散到全球各地的占領運動，都可以看到網路無遠弗屆的動員力量。的確，任何一種新的傳播科技都重新界定了人際關係的親疏遠近，在寬頻網路與行動上網普及化的年代裡，我們常發現雲端上的朋友往往比每天見到的鄰居更投契。一直有一派主張認為，新科技重新形塑了既有的權力分布，它使得溝通變得更容易、資訊更便利，因此它得以跨越既有的社會不平等，帶來廣泛的解放。

中研院社會所助研究員林宗弘在晚近的《非關上網？台灣的數位落差與網路使用的社會後果》研究論文中，挑戰了這種素樸的科技烏托邦論。他分析台灣的調查資料，結果發現每天上網的時數並不會影響個人的投票傾向，以及是否參與社會運動。因此，我們不能直接假定，越常接受網路資訊的個人，越會出現自由派的政治信念。的確，林宗弘的研究提醒我們不要過度誇大網路的政治效應；事實上，從以往的電話、電影、電視等現代傳播科技的陸續問世，我們沒有看到它們帶來一致性的後果。

儘管如此，要討論網路與社運的關係，仍有其他有意義提問的方式。在更多時候，重點不在於「網路本身帶來何種作用」，而是「社運參與者如何運用網路」。針對網路是否有利社運動員之問題，基本上，我認為有兩個理由，可以接受審慎的樂觀看法。

首先，相較於主流的傳播媒體，網路具有明顯的去中心化的性格，因此比較不容易被統治者控制與篩選內容，同時也利於弱勢者傳遞被認為缺乏「新聞價值」的訊息。特別是在威權主義的國家，網路已經成爲了一種具有高度反抗性的公共領域。近年來，儘管有層層的控制與監視，中國網民在微博（MicroBlog），利用各種暗語與代碼迅速地交換共產黨不想要讓人民知道的新聞，或是用各種「翻牆」的技巧來取得外國的資訊，即是明顯的例子。另一個可以思考的反例是八〇年代的台灣學運。在解嚴前，學運分子面臨了明的教官、訓導人員、黨部與暗的職業學生之控制，他們只能依靠少數的異議性社團、同學與室友關係進行動員。面對更廣大的校園同學，他們常採取「早安黑板」的宣傳作法，亦即在一大清早，偷偷摸摸地在教室黑板寫下批評政府的言論。可以預期的，這種前網路時代的運動方式十分沒有效率，往往在大部分同學進到教室之前，這些文字就被校方清除乾淨。

其次，網路的溝通平台也從第一代的全球資訊網與電子郵件，進展到web2.0的部落格，以及更晚近的社交媒體。其演進的方向在於更多的互動性，資訊的傳遞也開始依循著既有的人際關係，而不再只是消散於虛無縹緲的雲端空間。相對於其他平台例如Ptt，臉書是採取實名制，因此，不負責的言論與叫罵是不太可能躲藏在高度匿名化的使用者ID。再者，臉書不但使得朋友知道彼此關心的議題，也可以看到朋友的朋友之動態，因此有助於串連起關心若干社運議題的小眾群體。

社運之所以能夠創造歷史，推動社會變遷朝向進步的方向，並不是依循的「少數服從多數」的數人頭遊戲規則。無論是關於都更迫遷、失業勞工、媒體自由，大部分沒有表示意見的人民並不是保守的「沉默大多數」，在更多時候，他們是不關心亦或是根本不知情。因此，成功社運的關鍵往往是在於動員出有意識的或抱持同情立場的關鍵少數，而不是說服了原先的保守派。就這一點而言，分眾化的社交媒體是使得原先就存在的社運共同體（異議學生、NGO、自由派專業人士與學者）彼此之間的團結更爲緊密，而且也讓他們的訴求更能夠產生外溢作用，擴散至他們的圈外朋友。

簡而言之，當青年學生所直接感受到的世代不正義與中國威脅，巧遇了網路新媒體，其產生的結果就是一串連意想不到的新社運風潮。在未來，到底這股新生力量將會如何改變我們的社會圖象，這將會是一個具有挑戰性的知識與實踐議題。